

近几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成就的总结已经有不少论文论著,笔者也没有必要再锦上添花。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但是更不能妄自尊大。这几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学史以及诗歌史、散文史、词史、小说史、戏曲史等力图在超越几十年以前的写作模式,努力寻找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也尽可能将文学发展置身于时代精神中去考量,然而整体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给人的整体感受是文学内部发展轨迹的阐释或过于概括或线索模糊,文学外部环境的阐释显得过于宏观空泛。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论述更显得欠缺,有的仿佛为写而写,好像两张皮,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常常不是从大量的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理性的归纳,而是从既定的理论思维模式去简单罗列一些常见的资料,再做十分概括的阐述,于是往往给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除了论证材料的大同小异而外,著者均有建立独立的学术品格的主观努力,但学术研究的路径及论述的方法却很难给人以创新的感觉。文学内部传承流变的规律以及形成这些规律的动因揭示得不够。因此真正从本质上对几十年前同类著作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好的愿望。

就文学史的编写模式而言,很难达到深邃的历史意识、扎实的知识储备与通达科学的方法论的融合。基本没有摆脱几十年前的定格,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基本是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创作分期、内容与艺术、地位与影响。大作家一章、名作家一节,主要作品加具体分析。由于研究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许多研究者专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作家,更甚者一个朝代几十年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能否定这种研究态度,但是转身一变成文学史的编著者,就很难实现角色的成功转换,极易使文学史变成个案研究的集成品。

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以开拓学术研究领域为己任,比几十年前无论资料收集的广度、论述的深度都有很大进步,篇幅大大增多。然而文学批评史主要论述的依据与以前历代涉及的名篇大同小异,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未被注意,许多原始别集选集笔记等没有做资料长编,一些文学流派由于内部关系复杂,也没有深入论析。概括是明显的长处,但深入不够为明显的短处,文学研究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如何不被丰富繁杂的材料所束缚,是必须解决的课题。而从材料中走出来进行宏观审视时,不能片面取舍材料,而应该从全部材料出发,这样的理论才能令人信服。

中国文学批评的片面性正是其批评的策略,无论以意逆志、推溯源流、意象批评、论诗诗、诗格、诗评、摘句、选本等,方法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重感悟、重直觉,评论的语言又善用象喻,由于这些著者在历史上的身份地位使其理论富有极大的号召

很多时侯,指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学术思考的深入,研究视野的拓展,思想格局的提升……学术的每个点滴的进步,都离不开批评与争鸣。张瑞君教授是资深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文章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检讨。我们编发这篇论文,旨在期待学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不要忽视对以往的反思与总结,以便从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方铭)

古代文学研究反思

□ 张瑞君

力。后来的研究者如果不理性分析、批判地继承,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既定结论的泥潭中。这方面的教训也不在少数。而对于传统文学理论的范畴,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融入,有的研究著作力图解释这些范畴,但是没有用动态变化的方法,而仅仅是静态概括的归纳,有待深入细致的研究。一些著作静止地宽泛地简单套用在自己的研究里,必然失去针对性。

就断代文学研究或一个朝代某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并未进行原始文本的全部审视,如宋诗、明诗、清诗,近代小说等宏观研究对文本的全部审视费时巨大,因而便以传统审定的名家为研究对象,其他基本无暇理会了;有的只是主要个案研究的简单堆积,再在每章前加一个所谓宏观的静态的叙述。对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某一个时期文学内部与外部发展变化的轨迹缺乏深入的剖析。正如韦勒克所言:“如果要了解整个山脉,当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个最高的山峰。”

无论宏观研究也好,微观的个案研究也罢,文学的创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更有时代精神下的超越。其中的因素有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内部的个人经历、年龄变化、经验的积累等,对这个过程解释得越具体,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挖掘得越深,研究价值就越大。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大多习惯静态观照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归纳概括其总体风格。但是太概括则太抽象,归纳的仅仅是研究对象的更不显性。有时仿佛放在很多地方都适用,研究成果的价值大打折扣。

千百年来形成的经典判断标准严重影响研究者的评价与分析,从幼儿园、小学到中文本科专业的教材,历代选本,诗话等。个体的研究者一生都在挥之不去的影响中思考,想否认这些标准十分不易。作为研究者的知识谱系这个标准在左右,支配、影响自己独立的判断。那些不被重视的作家几十年的研究也常常有不被重视的现象。

学者试图拓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从哲学、文化学、佛学、书画

等角度切入,也产生了不少成果。这类成果开疆拓土的意义不容置疑,然而由于不少学者对这些学科缺乏深入的研究,有的对这些领域基本的文献尚未达到学懂弄通的程度就草草上马,免不了强做阐释、生硬分析,个别直接从这类研究成果中找材料找理论,再与古代文学理论简单挂钩,研究的成果就更难以令人置信了。

编年史、年谱、作品编年类著作论文不少,成就斐然。然而不少成果科学求证精神不足,对于研究对象有所创获,有时在现有材料根本无法得出结论的研究现状面前,大胆做人自己的超越。或将没有关联的材料强行索解,妄加联系;或违反无挂不信、孤证不信的原则,大胆假设,根本没有材料支撑;或抓住一条关系不大的材料无限延伸;或搜索一鳞半爪的无述,无限度猜想。为了对研究对象引起轰动、博得关注,从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材料出发进行论证,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只抓住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采取视而不见、避之不理的态度,更不能对所有有关的证据做系统周密的梳理,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难看出,近几十年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学者在考证的素养与能力上与前辈学者尚有一定距离。

文体史研究方面,材料的堆砌倾向比较严重,如何从纷繁的材料中上升为清晰的理性思辨成果,揭示文体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外力作用高度深度不够。揭示一种文体在每一朝代形成的独特个性的过程更不显性。给人总体感受基本上没有突破文学史编写的思维定式。

对杰出的文学家而言,文学创作仅仅是其全部人生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是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金石学家等。这些角色不断影响甚至渗透到其文学创作中,不仅仅局限在题材的拓宽,更直接作用于独特艺术风格,成为影响其艺术个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对其文学创作研究较为深入,对其他方面研究明显欠缺。为了研究,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下其他角色的学科就给予论述,很难深入融通。



一些西方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批评本身也是文学作品,这种观点还值得推敲。但是文学研究的著作与文章不应该这个模式,一种格调。古代文学研究的先辈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朱自清等的研究,不仅有理论高度,而且文笔灵动,论述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这几十年来,学者的文章应该有更大的飞跃,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文章似乎变得越来越呆板僵化,学术气越来越浓。风气所及,一些年轻学者的文章,也少见青年热情洋溢、才气纵横、语言鲜活。有的甚至掺杂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式,力求证明自己的老成。不少刊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保证刊物的稳健风格,有个性的文章也难以公之于世。久而久之,创造独特研究风格的激情被消磨殆尽,不得不迁就编辑的统一要求。时代飞速的进步并没有孕育出极富时代精神的文风,千篇一律的腔调与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相比黯然失色。

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批评极少,有一些只是具体学术观点的讨论。大量的综述只是一种学术发展的陈述或观点的概括,对研究的缺陷偶尔提及也只是蜻蜓点水,无关痛痒,有时好像为了文章的要求而画蛇添足。从学术积淀与态度、学术方法及规范等对学者及论著进行言之成理的批评的著作与论文凤毛麟角。大量的学者研究因为对象是前辈,更是尊崇有加,绝少反思批评。最多也只轻描淡写说说特殊时期政治运动对其研究的影响,对其研究结论的左右与无奈。许多学者的书评或同行情面或出于朋友请托,很少一分为二的深入评论。一些书评还有人为拔高、言过其实的缺陷。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批评,许多学者近几十年的学术路径与思维方法基本没有改变,没有主观超越的愿望与努力。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作者全面调动感知、回忆、想象、联想、幻想、理智等活动,又妙笔生花地挥洒在自我的话语体系之中,有说理不清的灵感诱因。许多研究者终其一生很少文学创作的实践,许多分析不可避免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结论也难脱隔靴搔痒的局限。

研究者不能只顾自己发声,还必须为时代的读者发声。对于传统的文学每个时代都应该用适合时代精神的眼光在继承传统阐释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研究者除了洞悉作家的心路历程而在外在统一的复杂过程。任何古今中外的理论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提供一种分析的方法。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这个系统的全部。实际上这种理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如果不采取批判继承中外文艺理论的态度,必然使理论失去应有的力量。

彼得·巴里曾经郑重告诫“绝不能认为理论文章的艰深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且不说研究者大多不是从原著中自觉地内化成自己的理论思维方法,而是从翻译的中文译文中引用,对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做认真思考,对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理论的深刻内涵,并未深入把握,以至于这种引用常常是浅尝辄止,并未对这种理论全面系统消化吸收,更没有对理论做充分的反思以后再大胆地运用理论。既能大胆利用外来的理论,又能根据研究对象来创造性地修正或改造理论,使其植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土壤,使其成为一种科学而又实用的方法,这方面十分成功的案例不多。有的为了点缀,但是否适合自己论述的对象,值得怀疑。理论不是无边际的,生搬硬套在边际之外的研究对象,必然产生误入为主牵强附会的弊病。

研究者习惯于运用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的传统思维来解释作品,其实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离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必须被转化为可以充分实现艺术效果的形式。由于对作品进行了二分之一的切割后,再进行二分之一以内的切割,一步步地肢解,作品的独创性有时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

智慧需要智慧者的发现,奋斗者才理解奋斗者的艰辛。文学创作活动是历史的存在。历史与现实共存于人类思维的空间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研究。如何对待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是每个研究者绕不开的话题。有不少研究者对自己研究对象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由于一些研究对象以往属于冷门,填补空白不等于非得抬高这些研究对象的价值,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学者为了引起对这些对象的关注,采取剑走偏锋式的人为提升。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人的成果面前望而却步,不敢超越,有演绎扩展前人成果的倾向。必须对以往的研究保持怀疑批判的继承态度,“对过去的每一种理解都包含着某种误解,因为我们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观察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研究是开放的,正像历史不存在终点。研究者存在的意义是必须在每个时代对已经研究过的作品发现其新价值,否则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近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惊人,而含金量明显不足。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太原学院院长)

《诗经》在法国

□ 刘国敏

为,《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也是一部真实性最无可争辩的文献”,正式开启了对《诗经》的民俗学研究。1843年他撰写了《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一文,拟出“中国人的体格特征”“服饰”“建筑与居室”“狩猎”“捕鱼”“农牧业”等二十个标题进行论述。德里文侯爵(Marie-Jean-Léon Leccoq, 1822—1892)亦认同毕欧的观点,他在《唐代的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 1862)的导言《中国的诗歌艺术和韵律》中探讨了《诗经》所揭示的中国上古文明。被认为是法国诗经学史最著名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本于1896年在河间府出版,其译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严格忠实于中国官方所推崇的朱熹学派的注法,这一版本多次再版。顾赛芬在其译本的导论中指出:“《诗经》可能是最能展现远古东方人民生活、道德习俗和信仰的一本书。它为道德家、历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为传教士提供了救助。”他在导论中沿袭了毕欧的方法,分五十个小标题对《诗经》中的文化点滴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解读和译介的另一位女汉学家,当属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 1845—1917)。她于1867年编译出版了中国诗集《玉书》(Le Livre de Jade),其中译介《硕鼠》《伯兮》《将仲子》《女曰鸡鸣》和《南山》等篇目。戈蒂耶并未遵循于原诗的结构和形式,包括对意义的分析在内,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改写。但她却是真正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加以关注的。《诗经》不再是传教士眼中用以传教的钥匙,也不再是毕欧、德里文心中的道德风俗宝库,她惋惜于孔子编订时为何只留下305首,缺失了抒情性与激情的诗篇。

有首次被全文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大序》(Grande préface),译自朱熹的《诗序辨说》,但此书影响不大。

20世纪初,法国诗经学已臻至成熟,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将视线转向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学读本。然而法国诗经学并未停滞不前,研究学科的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与多样化,从多方面促进了法国诗经学的再次蓬勃发展,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将法国诗经学推向顶峰。

1919年,全书除引言和结论外,分为两部分:《诗经的情歌》和《古代的节庆》。他以人类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阐释,分析了《诗经》中的情歌,考察了上古时期朴野的习俗是如何转化了“文明的秩序”,解析中国古代的宗教习俗和民族信仰。葛兰言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上古时期的面貌。

20世纪初,有一大批中国学者赴法留学,完成了大量的博士论文,在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且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其中不乏对《诗经》的译介,如曾仲鸣(Tsen, Tsouning)的《中国诗史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 1922)第一章便是对《诗经》的介绍;徐仲年(Hsu, Sung-nien)《古今中国文学选集:诗歌、小说、戏剧、哲学、历史》(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La poésie — le roman — le théâtre — la philosophie — l'histoire, 1933)也对《诗经》进行了译介。

1937年,张正明(Tchang, Tch'eng-Ming)同时在上海(上海图书馆)和巴黎(Librairie Orientaliste P. GEUTHNER)出版《诗经中之对偶律》(Le parallélisme dans les vers du Cheu king),从《诗经》语言文字的韵律入手,详细论证了《诗经》中的韵律。中国留法学者由于兼跨两种文化,他们的介入,给法国诗经学的研究增色不少。

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等有影响的汉学家先后离世,加之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法国诗经学逐渐式微,法国诗经学也由此而衰落。虽然经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等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之内,法国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又开始复苏,也有论者在谈及中国文学史时会提及《诗经》,但鲜有重要的译本与研究。对法国诗经学在21世纪的发展,我们报以新的期待。

(作者系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讲师)

文学遗产

本报教育部 主办
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协办
本期主编: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2018年第12期 总第918期